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归有光

精品全集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

文基连女士指正

赵伯陶

一九九八年七月



归有光

● 赵伯陶 选注 大连出版社

1998·大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郭预衡,侯光复主编, - 大连:大连出版社,1998.4

(月亮文库/康琳,侯光复主编)

ISBN 7-80612-467-5

I. 中… II. ①郭… ②侯… III. 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古代
IV. I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205 号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全 11 册)

郭预衡 侯光复 主编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三河市科教印刷厂印刷

字数:2700 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3 插页 55

印数:0 001~8 000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许文彦 责任校对:刘青 宋丽
装帧设计:北京羽人创意设计中心 陈正平 程萍

ISBN7-80612-467-5/I·70

登记号:(辽)第 15 号

定价:198.00 元(全 11 册)

前 言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散文创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散文创作而闻名的大家不少。其中可称祖师者，有先秦的庄周、汉代的司马迁；可称大家者，有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和苏轼。唐宋以后，可同大家比肩者，有明代的归有光，可与大家抗衡者，有晚明的袁宏道。其作品或汪洋恣肆，或生动传神，或逻辑严密，或文采横溢，均具有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无论是阅读、欣赏还是收藏，这十位大家散文创作中的精品，都是当之无愧的艺术绝品，堪称“国宝”。

《中国古代十大散文家精品全集》11卷11册，选编了这十位散文家的全部经典之作。其中，《集外卷》还汇集了自先秦至清末除此之外其他作家的散文精品。若以单卷论，本书收入了中国古典散文十大家一生中最重要作品；若从整体看，本书在时间上跨越了中国古典散文创作的全部历史时期，几乎囊括了代表各个时期散文艺术最高成就的佳作名篇。

本书的读者对象是一般文学爱好者，而非文学研究专家。因此，其选注体例多从有助于阅读与欣赏着眼，不特别强调学术创新。选注过程中，尽量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一不标新立异，二不作繁复辨析，只取多数学人认可之说。

本书每卷均含“作者小传”、正文和附录三部分。“作者小传”扼要介绍散文家的生平活动和创作特色,使读者对作者的一生有个总体了解。正文中,每篇文章后一般都有“题解”和“注释”。前者主要介绍写作背景和作品主题。后者意在扫除阅读中的语言障碍。如果读完本书后,读者还想对该散文家作更全面的了解,“附录”中的作者“生平创作简表”和“散文版本简目”可以起到引路作用——读者据此可以找到该散文家的其他选本或文集,进一步研读。

本书入选的散文作品大多按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排列,而且除庄周、司马迁和王安石以外,每个散文家的作品都按作者生平活动的阶段性或作品思想艺术的变化加以分期。这在其他选本中是不多见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一般读者更好地把握每一篇作品特定的思想内容。当然,作家们的艺术创作是自然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能截然分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的任何一种理论上的分期都会有其不完善的地方。这些地方有待于学术界从其他角度再去完善或弥补。

本书在选编过程中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许多专家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管士光先生和北京出版社的李志强先生。没有诸位专家学者及同仁的热情相助,本书是不会这么顺利出版的。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归有光的 生平与 散文创作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于明代散文的总评价虽不高，但却给归有光留下一个显赫的地位，他在《明文案序》中说：“议者以震川为明文第一，似矣。”论者一般将归有光划入唐宋派中，唐宋派晚于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三、四十年，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大致同时。在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义氛围中，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诸人能够不傍门户，与拟古之风相抗，给明中叶以后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气，因而受到后人的推崇。然而在唐宋派中，归有光的情况又较为特殊，他年纪稍长于前三者，得中进士却晚于他们三十年左右。功名路上的坎坷，限制了归有光与唐、王、茅三人的声气相

通；长年的读书授徒生涯，却又使他有了不断自我提高的充裕时间。归有光虽于散文理论建设上用力不多，却能于散文创作上独树一帜风格，成为后世的楷模，的确有其非同凡响之处。从其生平入手，在宏观上把握其散文的文化品格，对于我们鉴赏归有光的散文是不可或缺的。

归有光，字熙甫，又字开甫，早年自号项脊生，晚年又号震川，学者称震川先生。明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他生于明武宗正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507年1月6日），卒于明穆宗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7日），享年六十五岁（旧籍与今人有关论著多记其享年为六十六岁，不妥。其说参见本书“附录一”后之注）。归有光晚年写《重修承志堂记》一文，记其生时家中承志堂前“尝有虹起属天”，颇为自得。他去世后，大学士王锡爵为之作《归公墓志铭》提到了此事：“先生在孕时，家数见祯瑞，有虹起于庭，其光属天，故名先生有光。”事虽为不经之谈，但在古人心目中，其出生自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天人感应之兆，对于自幼明悟绝人的归有光来说，也有不能低估的终生心理影响。

归有光的曾祖父归凤，为成化间举人，官城武（今山东成武）知县。归有光的祖父归

绅、父亲归正，仅为县学生员，没有做过官。在《家谱记》一文中，归有光不无痛心地说：“归氏至于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远而未分，口多而心异。自吾祖及诸父而外，贪鄙诈戾者，往往杂出其间。率百人而聚，无一人知学者；率十人而学，无一人知礼义者。”言外之意，归有光将振兴归氏家族的重任毅然自我承担了下来，并与其澄清天下之志联系在一起：“余少时有狂简之志，思得遭明时，兴尧、舜、周、孔之道，尝鄙管、晏不足为。”（《梦鼎堂记》）归有光六、七岁时即从塾师周寅之学《孝经》，《先妣事略》记述说：“有光七岁，与从兄有嘉入学。每阴风细雨，从兄辄留，有光意恋恋，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觉寝，促有光暗诵《孝经》，即熟读无一字齟齬，乃喜。”有如此严厉的母教，促使归有光早年即显露才华，八、九岁时即能成文，并写出《乞醯文》那样逻辑严密的文章。他十三岁应童子试，十九岁以第一名补苏州府学生员，功名似乎唾手可得。然而命运从此淹蹇，归有光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功名之路。他六赴乡试，九上春官，每三年都照例一番拼搏，才于三十四岁考中应天府乡试举人，将近六十岁考中一名三甲进士。由于名次靠后，他不能入翰林院这个清要之地，只被除授长兴县令。《明史》本传称归有光在县令任上：“用古教化为治，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乞遣去，不具狱。大吏令不便，辄寝阁不行。有所击断，直行己意。大吏多恶之。”显

然，归有光违反专制官僚政治运作规律的做法激怒了他的上司与地方豪强势，受到排挤，故被明升暗降般地迁官到顺德府（今河北省邢台市）去任副职通判，专司马政。此官属闲差，所谓“此官于今唯以无事为得职”（《顺德府通判厅右记》），无可奈何中，归有光只能以读书消遣岁月。此后由于大学士高拱、赵贞吉的保荐，才升为南京太仆寺丞，并留京掌内阁制敕房，纂修《世宗实录》。在这个位置上，归有光可以读到外间难以寻觅的文献，方期大展宏图，却又匆匆离开了纷扰的人世，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功名仕途的坎坷，令归有光“修齐治平”的儒家理念难以实践；而家庭屡遭变故的不幸，更导致了他生活的辛酸备尝。归有光七岁丧母，二十七岁时原配夫人魏氏卒，四十五岁时继配夫人王氏又卒。其间他的长子子孝与两个女儿如兰、二二皆早夭，这种丧失亲人的打击，其强烈程度不言而喻。据归有光《请敕命事略》称，其原配魏氏“事舅及继姑孝敬，闺门内外大小之人，无不得其欢。”魏氏曾对归有光说：“吾日观君，殆非今世人。丈夫当自立，何忧目前贫困乎！”他的继配王氏也是位贤妻良母，嘉靖二十九年（1550），归有光第四次赴京会试铩羽而归，“时芍药花盛开，吾妻具酒相问劳。余谓：‘得无有所恨耶？’曰：‘方共采药鹿门，何恨也？’”（《世美堂后记》）对于一位用世心切的读书人，魏、王二人之语，一先一后相映生

辉，不异于最大的安慰。“有光自叹，生平于世无所得意，独有两妻之贤，此亦释家所谓随意眷属者也。”（《请救命事略》）这番话的确是归有光的由衷之言。

由于仕途蹭蹬，归有光长期读书授徒，这使他的散文创作有了精益求精的时间保证；由于家庭变故，归有光屡遭情感折磨，这又增加了他的散文创作的感情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归有光所遭受的命运双重捉弄反而玉成了他的散文创作，这或许可算是他个人的不幸中之大幸了。

二

归有光身处嘉靖、隆庆之世，朝廷政治尽管日趋腐败，但全中国却处于一个思想启蒙的变革时代。侯外庐先生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一书中认为：“中国启蒙思想开始于十六、七世纪之间，这正是‘天崩地解’的时代，思想家们在这个时代富有‘别开生面’的批判思想。”所谓“这个时代”，约相当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1522—1619），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大多集中于这一历史阶段的探索，即是明证。以商品经济发展为杠杆的市井文化的不断丰富，影响了文人士大夫雅文化的发展道路；以王阳明心学为主的哲学呐喊，更加速了这一影响的深刻性。老庄禅悦的佛光道影也在明中叶

以后有了笼罩知识阶层的魅力，给文人士大夫的“出处行藏”增加了理论上的多种选择。在散文的发展史中，稍后于归有光时代的晚明小品的大放奇光异彩，就是市井文化与老庄禅悦思想作用于文人的士林文化的结果。雅与俗在晚明小品中的沟通，使古代散文有了新的面目，无论是袁宏道三兄弟，还是钟惺、谭元春竟陵派的散文小品，无不体现着情与理的冲突、真与趣的追求、痴与癖的执著，而精警与哲思，淡雅与飘逸，谐谑与幽默，更令晚明小品摇曳多姿、动人心魄。

然而归有光的散文却与晚明小品难以同日而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化品格的大相径庭。归有光散文的文化品格较为单纯，以儒家“修齐治平”为目的的正统思想，始终占据了归有光的整个身心。为了保持这士林文化的纯洁性，归有光以程朱理学为本，对陆王心学虽不大力反对，却也畛域森严，毫不含糊。在《与潘子实书》一文中，归有光议论说：“又窃谓经学至宋而大明，今宋儒之书具在，而何明经者之少也？夫经非一世之书，亦非一人之见所能定。而学者固守沉溺而不化，甚者又好高自大，听其言汪洋恣肆，而实无所折衷；此今世之通患也。”如果说此论矛头尚不明确，那么《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一文所论则针对性明显了：“朱、陆之辩，固已启后世之纷纷矣。至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即孟子之言性善已尽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为标的

耶?……夫今欲以讲学求胜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与其在朝居官,无不可与天地对者。讲学之徒,考其行事,果能有及于朱子万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区区空言胜之!”这一番话已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公开揭出批评了。《送狄承式青田教谕序》则云:“而浙东学者,近岁浸被阳明之教,为致良知之学。承式为人敦朴敛约,不喜论说,而中有自得者。今为人师,不容默默,亦将出其所有,以考论其同不同何如也。”此外,在《示徐生书》与《戴楚望集序》等文中,归有光都表示出自己与王阳明心学“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后一文中又有“又怪孟子与荀卿同时,而终身不相遇”之壁垒森严之论,显示出归有光未受心学浸染的事实。

同为唐宋派主将的唐顺之,却与阳明之学有着甚深的渊源,他的《书王龙溪致知议略》一文,评论王门弟子王畿的《致知议略》,显示出他对王氏心学“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悟性。其《荆川集》中又有禅宗影响的痕迹,唐顺之散文的文化品格近似于其后发展起来的晚明小品,至于他提倡文章要“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的“本色”(见《答茅鹿门知县二》),体现了个性与天趣的重要,已与晚明兴盛起来的小品精神完全一致了。现代学者钱基博评《荆川集》有云:“集中书牍最多,大半肤言心性,多涉禅宗,而喜为语录鄙俚之言,殊为不取。”(《明代文学史》)唐顺之

散文的文化品格与归有光散文的文化品格有着质的不同，将他们一起划入唐宋派，仅是从外部特征着眼，如果从内质上分析，两人并非“同一战壕中的战友”。

归有光常言科举命数，有论者认为这是他受佛学影响的证明。他曾说：“夫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解惑》）在《王梅芳时义序》一文中，归有光发议论说：“梅芳论人之命运，穷达早晚，皆有定数，惟其所以自立者，不可以少有所失。其语亦人之所能道，而言之独有旨。他人言之，不能如梅芳也。以是益信其为君子。”所谓“科名有命文无功”，命数观在科举时代的莘莘学子之中大有市场，衡文标准的不确定性，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而将考场败北委之于命运的捉弄，也多少可以平衡一下落魄心理，激发起再做冯妇的雄心。可以说考生信命，不能视为向心佛学的佐证。归有光的一生始终以“致君尧舜上”的儒家理念为帜志，他批判科举弊端，也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发言的。《与潘子实书》云：“科举之学，驱一世于利禄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蔽已极。士方没首濡溺于其间，无复知有人生当为之事。”何为“人生当为之事”？他在《跋小学古事》一文中说：“自科举之习日敝，以记诵时文为速化之术，士虽登朝著，有不知王祥、孟宗、张巡、许远为何人者。”显然，儒家倡导的为子孝、为臣忠的伦理观，是归有光

的人生理念。精读儒家的圣贤之书，则是归有光修身的根本，他在《送童子鸣序》中说：“夫今世进士之业滋盛，士不复知有书矣。以不读书而为学，此子路之佞，而孔子之所恶。无怪乎其内不知修己之道，外不知临人之术，纷纷然日竞于荣利，以成流俗，而天下常有乏材之患也。”

归有光倡导读儒家圣贤之书，并非食古不化，而是有其服务于“今世”的现实意义：“余尝谓士大夫不可不知文，能知文而后能知学古。故上焉者能识性命之情，其次亦能达于治乱之迹，以通当世之故，而可以施于为政。顾徒以科举剽窃之学以应世务，常至于不能措手。”（《山斋先生文集序》）归有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对科举之弊端大加挞伐的，绝非仅是“葡萄酸”的心理在作怪。在《山舍示学者》一文中，归有光对从学的众生谆谆教导说：“第今所学者虽曰举业，而所读者即圣人之书，所称述者即圣人之道，所推衍论缀者即圣人之绪言，无非所以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而出于吾心之理。”他所指责的是以举业为沽名钓誉、攫取富贵的速成之路：“近来一种俗学，习为记诵套子，往往能取高第。浅中之徒，转相放效，更以通经学古为拙；则区区与诸君论此于荒山寂寞之滨，其不为所嗤笑者几希。”教学相长，归有光在教授生徒中也不断坚定着自己的儒家理念，从而使其散文的士林文化品格

越趋鲜明。

《赠医士张云厓序》是归有光的早年之作，但已可明显看出他痛斥“士大夫学术之不古”的愤世思想，在他慨叹“世道之变”的疾呼中，我们已可明显感到其散文与明代某些小品作家如袁宏道等人的区别之处：他没有放浪形骸之外的潇洒之态，更多的却是正襟危坐的岸然道貌；他不追求适意人生的趣味，而仅想于孜孜矻矻的不断努力下完善自我的人格。可以说，归有光的散文充分地体现出他对“文以载道”论的执著，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归有光受了清代桐城派的推崇与敬仰。方苞论文讲求“言有物”与“言有序”的义法说，强调“雅洁”的论文标准；刘大櫟论文提出“神气”说；姚鼐则以“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之论丰富了义法说。他们的文论虽不见于归有光的有关文章，但其价值取向却早为归有光所实践。姚鼐选《古文辞类纂》一书，入选归有光的散文达三十二篇之多（包括序跋类二篇、赠序类八篇、传状类七篇、碑志类七篇、杂记类八篇），也正是从实践角度立为榜样的。桐城派与归有光的散文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两者又皆源于《史记》以来经唐宋散文发展后的“文统”，自属士大夫雅文化的范畴。

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归有光散文的士林文化品格的单纯性也是灼然有据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桐城谬种”与“选学

妖孽”均在被口诛笔伐之列，偏偏是晚明小品文却大行其道，被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捧上了天，如果联系这一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们就不难理解“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巨子们好恶去取的深刻用心了。归有光的散文恰是这一儒家“文统”中的一环，其文化品格自然没有启蒙或思想解放的色彩，而只能是士林文化品格的执著显现了。

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归有光散文的思想内容有其保守的一面，然而他却不是头脑冬烘死读书、读死书的迂夫子。他关心时事，写有不少有关水利、倭寇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文章。如他写有《三吴水利录》四卷，成书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归有光时年四十岁。《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云：“是书大旨以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他水不劳余力。当时堤防废坏，涨沙几与崖平，水旱俱受其病，因采集前人水议之尤善者七篇，而自作《水利论》二篇以发明之，又以《三江图》附于其后。”又说：“有光居安亭，正在松江之上，故所论形势，脉络最为明晰。其所云宜从其湮塞而治之，不可别求其他道者，亦确中要害。言苏松水利者，是书固未尝不可备考核也。”可惜他的建言未被当局者重视，直到隆庆三年（1569），应天巡抚海瑞才注意到归有光的治水策略，用

来疏治吴淞江，全活无数生灵（见丁元正《修复先生墓记》）。

嘉靖间，日本海盜倭寇肆虐我国东南沿海，荼毒江浙一带。归有光写有《御倭议》、《备倭事略》、《论御倭书》等文章，建议御倭于海上，并设法招徕被倭寇裹胁之中国百姓，使真正倭寇受到孤立。这些议论是建立于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并非书生空言。归有光被人排挤，去顺德为倅，管理马政。尽管投置闲散，用非所学，他却敬业为民，写有《马政议》，广征博引，尽输忠悃。

关心社会问题，同情弱者，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伸张正义，讨还公道，在归有光的散文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嘉定张氏女子遇人不淑，又逢恶姑，她反对恶少与其姑的丑行，最终为群凶所虐杀。事实本来清楚，却因封建官场的因循迁延，狱久不决。嘉靖二十三年（1544），三十八岁的归有光下第南归，闻此事后，激于义愤，到处为死者奔走呼号，写有《与嘉定诸友书》、《张氏女子神异记》、《书张贞女死事》、《答唐虔伯书》、《与李浩卿书》、《贞妇辨》、《与徐殷陆三子书》、《答俞质甫书》、《张贞女狱事》等一系列文章。在归有光等人的努力下，肆虐诸元凶终于被法办。在《与嘉定诸友书》中，归有光愤慨已极地说：“烈妇之死，极其惨酷，凡有人心者，皆欲啻而食之，元凶大慙，暴戾恣睢，据人之室，窃人之财，杀人之妇，此而不诛，则人将相